



北京学研究

201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主编 张宝秀
副主编 张 勃



北京学研究

主编 张宝秀
副主编 张 勃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学研究 . 2017 / 张宝秀主编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9

ISBN 978 - 7 - 5203 - 2941 - 5

I. ①北… II. ①张… III. ①城市学—研究报告—北京—2017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907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吴丽平

责任校对 赵雪姣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66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 委 会

主 编 张宝秀

副 主 编 张 勃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李建平 成志芬 刘同彪 朱永杰

张 勃 张 艳 张宝秀 虞思旦

外语审校 安亚男

目 录

理论探讨

- 将遗产研究、保护和活化利用作为地区稳定发展的一个
要素 [俄罗斯] IO. A. 维杰宁著 卢振宇译 凌庆芳审校 (3)

专题研究：三个文化带与北京城

- 首都与大运河 蔡 蕃 (31)
论大运河的人民性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人民城市”
 设计理念 陈喜波 (63)
试论明清时期漕运对京通互动关系的影响 曹婉琳 朱永杰 (73)
燃灯佛舍利塔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中的文化
 地位与保护思考 于 洪 (85)
张家口长城对首都北京的意义 韩祥瑞 陈韶旭 (93)
明代长城北京段昌镇研究初步 滕艳玲 李 芸 (101)
颐和园在西山文化带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孙 震 (116)
浅谈北京香山寺的历史与保护复建 邵 婧 (127)
京西寺院与京城各界人士的互动
 ——以戒台寺为例 朱 可 (139)
“下院”与辽代南京道地区佛教文化网络 李若水 (149)
康雍乾时期永定河的泛滥及其防治 张功力 (163)

地 方 案 例

- 西山大道的起点
 ——三家店村落文化调查 刘文丰 (181)

2 目 录

- 北京景山和北海公园的公众文化感知分析 邹玉蓉 逯燕玲 张宝秀 (194)
北京高碑店“二月二龙抬头”文化节与社区传统
文化的传承 李彩萍 (208)

学术综述

- 大运河京津冀段研究状况分析 刘聪聪 张宝秀 (219)
“长城、运河、西山文化带与北京城”第十九次北京学
学术年会综述 宋凯丽 孙 蕾 (232)

北京学人

- 北京学研究的倡导者、支持者、引领者
——记北京学研究所名誉所长陶西平先生 ... 虞思旦 张宝秀 (243)

理论探讨

将遗产研究、保护和活化利用作为 地区稳定发展的一个要素^{*}

[俄罗斯] Ю. А. 维杰宁 著^{**} 卢振宇 译 凌庆芳 审校^{***}

摘要：遗产被视为由我们的先辈创造并保存下来的物质和非物质财富体系，这些财富的普世意义被现代社会认同，并且被视为后代生活的必要条件。社会和生活环境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构建独特、稳定和多样的文化景观空间。对遗产的保护和有效利用能够构建拥有文化和自然多样性的、地域完整性的、地区唯一性和代表性的生存环境。遗产是多学科研究的客体，近几年的实践表明，地理学的经验在研究文化自然遗产的各类客体，解决与发现、描述、保护和利用遗产相关的现实任务中能顺利适用。研究和保护遗产的地理原则包括保护文化和自然多样性的原则，区域完整性原则，地区的唯一性和代表性原则，文化景观原则和生态原则。研究和保护遗产的方法则包括保护和有效利用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的地区规划法，文化景观的保护和修复方法，在修复历史文化景观的背景下恢复消逝的景观要素的方法，恢复可视走廊的方法作为将历史开放空间有系统地组合起来的手段，研究考古遗产的古地理学方法，景观符号的保护和恢复方法等。在俄罗斯，为了有效实现遗产的功能，需要建立有效的遗产保护和利用

* 本文原文为俄文，载于〔俄罗斯〕А. А. 季什科夫, Д. М. 果莱特内主编：《俄罗斯及其地区：一体化潜能、风险、转向稳定发展的道路》第85—111页，《稳定发展：问题与前景》系列，第五卷，KMK科学刊物出版社2012年版。

** [俄罗斯] Ю. А. 维杰宁 (Yury VEDENIN)，男，地质学博士，教授，俄罗斯科学院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遗产研究、保护和活化利用。

*** 卢振宇，男，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专业研究生；凌庆芳，女，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专业教授。

机制，这包括：编制完整的俄罗斯文化遗产清单，包含所有各类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创建俄罗斯文化空间支柱性框架，包括建成创新文化中心以及与可靠交通网络相关的文化遗产集中的中心体系；构建有效的组织结构，确保在遗产集中地区综合保护、维持和有效利用文化遗产。

关键词：遗产；遗产保护；遗产研究；遗产利用；地理学

对构成智能圈的智力和精神原则的基础性作用的认识以及对遗产在稳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的认识是本文的基础。同时遗产被定义为由我们的先辈创造并保存下来的物质和非物质财富体系，这些财富的普世意义被现代社会认同并且被视为后代生活的必要条件。因此本文是在形成独特、稳定、多样的文化景观空间的背景下分析遗产保护。

遗产是许多学科研究的对象。近几年的实践表明，近年来明显加强了地理学——一门旨在研究遗产客体的地域性和复合性学科的作用。这能够揭示遗产在构建国家文化空间支柱性框架方面的特殊意义，这一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及其生活环境的进一步发展。

近几年所形成新的保护和利用遗产的战略，包括以下一系列的主要原则。

第一，承认遗产在形成最重要的社会秩序和民族自觉意识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遗产是环境的一部分，能够保障人类舒适生存、适应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世界。

第二，承认文化和自然相互作用的现实意义，在制定保护和有效利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规划时考虑到这一因素的必要性。因此，一方面来说，要特别重视自然环境、重视影响遗产客体状态的生态因素；另一方面来说，在制定特别自然保护区体系时，重视传统文化在环境保护活动中的作用。

第三，承认保护的主要客体是带有各类遗产要素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地域，在这些地域保留了文化和生产活动的传统方式以及在历史上形成的人口分布体系。

第四，承认将作为遗产客体的文化景观的概念纳入自然保护活动和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中去，这使得能够在同一完整的文化自然综合体的框架内，研究多种动产文物和不动产文物、自然遗迹以及传统的非物质和精神

文化遗产的价值（文化景观，2004 年）。

第五，当保护的主要对象不是遗产本身，而是以遗产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时，承认“自然”疗法对遗产保护的现实意义。需要重视社会对遗产的态度，因为对现代人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空间，而且要了解其周边遗产的价值，将遗产视为周边环境重要的和天然的一部分，视为全面实现生活价值的必要条件。

第六，承认遗产在社会经济空间形成中的特殊作用，因为目前遗产已成为区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文化景观，2005）。遗产的经济作用作为区域和地方经济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那些没有发达工业和农业的省份、小城市和村庄中显得特别明显。

一 遗产保护领域的新战略

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智能圈和文化生态学应当成为新战略的基础。著名俄罗斯科学家 V. I. 韦尔纳斯基和 D. C. 里哈丘夫对这两个概念的研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地球化学和生物化学的创始人之一、科学家 V. I. 韦尔纳斯基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他发展作为地球发展新阶段的智能圈学说，这一阶段首先是和人类的科学和智力活动相关。学者 D. C. 里哈丘夫，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古代俄罗斯文学史，在他的许多著作包括论文研究中谈到了人类创造改变的大自然的语意，他发展了文化艺术对人生存环境的影响这一主题。他主要关注在自然环境和其文化成分形成过程中的精神原则。保护文化环境——这一任务的重要性不亚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如果自然环境对人在生物学上的生存是必需的，那么文化环境对人的精神、道德生活，对他的‘精神家园’、对他的道德自律和道德的社会性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里哈丘夫，2000 年，第 81 页）

根据里哈丘夫的理论，人构成了地球上特殊的道德精神环境，这一环境决定了其他所有环境的发展并且同时受到这些环境的巨大影响。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和 V. I. 韦尔纳斯基的智能圈理论相仿，这一理论将思想和劳动视为景观形成过程中的特定力量。“在生物界形成了一种新的智慧和技术的地质力量，这种我们认为拥有无限能量的力量以前在地球上不存在，并且将来也可能从地球上消失。”（韦尔纳斯基，1975 年，第 165 页）

但是宗教、道德和文艺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和精神价值在环境形

成过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因素的现实性、文化在形成保护和发展环境的现代概念中的地位正在于此。

文化阶层、文化环境的能量增长过程是显而易见的。同时里哈丘夫也关注反向的进程。“‘储备’文物、‘储备’世界上有限的文化环境，并且这些储备也会以不断加快的速度日益消耗。”（里哈丘夫，2000年，第86页）

里哈丘夫认为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必须对文化和自然遗产持特殊态度，需要积极开展对遗产的保护活动。相应的我们可以号召重读这两位伟大大学者的作品，因为正是在他们的学说中首次提出了智力和精神原则在智能圈形成过程的基础性作用的概念，以及历史文化遗产在整个环境形成、保护和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这一概念。这些理念正在形成新的保护遗产的方法。从原则上能决定重新对待遗产方法中，应当举出以下方法。

——遗产法，这种方法主张遗产被视为是决定保护民族或者区域文化的历史记忆载体，同时，遗产以独有的方式发挥自己的作用。借助于这一方式，历史记忆渗入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原则对所有遗产客体都是公平的——不仅对文化遗产，而且对自然遗产。研究遗产，我们可以运用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关于遗产的知识，恢复一些地区、城市、农村、自然区的自然和社会历史，提出历史因素在当今社会、经济和文化管理过程中的重要性，在制定社会进一步发展、整治自然环境时考虑到遗产。

——生态法，这种观点认为对遗产的珍视态度是社会和生物界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对生态要素的轻视、对生物多样性环境保护必要性要求的忽视造成对地球的威胁，导致了作为一个生物星球生存本身的灾难性情况的产生。文化遗产在“社会—环境”系统形成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这个系统像某一个常数、像这一复杂社会文化和自然体系的特有核心，并决定着系统的稳定，同时并不阻碍其进一步发展。

——地域法，这种观点认为遗产被视为是世界、国家、某些地区、民族共同体和居民群文化和自然多样性保护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只有在保护和经常更新地球上所有历史文化和自然阶层成分的情况下，包括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形式，才能实现地域的多样性。重要的是，同时保护表现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历史文化景观，以及在漫长历史阶段形成并保存下来的这一地区特有的文化自然遗产多样性的记忆。因此，只有在珍视民族和区域文化景观特性的情况下，才能保持文化多样性。

关于遗产是构成独特、稳定和多样的文化景观空间的决定性因素这一

理念是所有这些方法的基础。

但是这一论点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是公正的，即在最广泛的概念下理解遗产并把遗产视为我们先辈所创造并保护的物质和非物质财富，这些财富的普世价值不仅被现代社会认同，而且被现代社会视为未来人们生活的必要条件。

正是这一观点逐渐在国际和国内一些决定国际社会对遗产的态度及遗产在区域发展中作用的文件中推行。确定将遗产列入基础性范畴的理念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是，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2005年）。这一文件第一次形成了决定现代社会对遗产态度的许多概念和原则。随后通过了许多其他文件，这些文件明显扩大了上述理念。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以及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通过对这些文件的分析，可知国际社会承认遗产在实现文化多样性和稳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同时，这些公约中的大多数条款并没有实现而且在大部分国家仅以宣言的形式被接受。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十三届欧洲各国负责地区规划的部长大会上（卢布尔雅那，2003年9月16—17号）通过了《关于发现乡村遗产的欧洲准则CEMAT》，在这一文件中强调了遗产作为稳定发展核心要素的特殊作用。根据欧盟委员会成员国部长办公室关于欧洲大陆稳定发展基础性原则的建议，对这一文件进行了修订。在这一建议中提出了以下具体几点：加强遗产在教育中的重要性；改变在遗产领域的国家政策；为发展旅游、传统民族行业、生态食品生产更加积极利用遗产，将地方遗产纳入到与保护利用遗产及构建地区更好发展必要性相关的规划中。

遗产是多学科研究的客体。同时更频繁地利用了以下学科的原则和方法，诸如艺术理论、民族学、考古学、生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目前地理学也被纳入与研究文化自然遗产相关的学科体系中了（维杰宁、舒利金，1992年；舒利金，1995年；马克萨科夫斯基，2002年，库列索娃，2000年；马祖洛夫，2003年；卡鲁茨科夫，1998年；扎米亚京，2003年等）。近几年的实践表明，地理学的经验在研究文化自然遗产的各类客体，解决与发现、描述、保护和利用遗产相关的现实任务中能十分适用。根据研究遗产在稳定发展中的作用，地理学的方式和方法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最重要标志是它的系统性，旨在研究分布于地球表面、地理外壳范围内的客体的地域性和综合性。

遗产的地域性表现其在地理空间中的不均匀分布；遗产在形成和退化过程中以及国家和社会在遗产保护和利用中的地域性和区域性证明了这一点。自然条件、民族构成中的差异，不同国家、民族发展的特点，文化进程的地域多样性——这一切决定了世界、民族和地方文化自然遗产表现特征中的地域多样性。

遗产的综合性是指地域综合体（景观、地域、城市、庄园等）愈发成为保护的客体，文化和自然、物质和非物质财富是综合体的组成部分，同时，社会和专家都开始认识到这个事实，即遗产的保护不能脱离其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

在地域规划、城市重建、乡村转型和发展工业区时，低估遗产或者忽视遗产的特性可能会导致独一无二的大自然的退化，或者破坏有价值的历历史文化环境，并且同时损耗本地现存的资源，不仅对本地居民的生活条件产生不良影响，而且也会对全体人类产生不良影响。忽视千百年来社会文化规则所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财富会导致在经济制度改革中作出错误决断，对政治改革的效果、对重新修订立法文件的顺利适用产生影响。

了解形成和保护遗产的地理学的合理性能够及时采取应有的措施并且同时预防遗产退化，提早预见会对遗产存在，以及为了当代社会和后代的利益积极利用遗产是必要的。

二 形成遗产的地理因素

自然地理因素。自然地理因素是各种自然地理进程和现象的多重行为产生的结果，其中包括地方气候的差异、地理和水文进程现象的差异、建设过程中所使用的自然材料的多样性差异、植物的结构和种类的差异，等等。

在保存至今的自然地块上固定下来的自然进程的痕迹（不仅发生在地球表面形成时期的远古时代，而且发生在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多次巨大自然灾害时期）现在经常被视为遗产的客体。很明显，这类地球表面进程的表现力因地域而不同。可以对比说明分布于山区和平原的遗产客体、形成于流水作用区域和分水岭的遗产客体。自然因素的作用不仅表现在自然遗产的形成过程中，而且表现在历史文化遗迹的形成过程中。首先这是针对与自然、自然景观和其他特性及成分有最紧密联系的客体。其中包括阶

地、古代山地坑道、木质和石质建筑集中地区、各种打猎或者捕鱼设备的特点和广泛性，等等。建设过程中所使用自然材料的本身特点、构筑物的建筑风格和结构都取决于自然条件和当地的自然特点。分布于各种自然条件并且特别是极端自然条件地区的居民点的建筑特点、房屋的结构特点——这都反映了自然因素对遗产客体形成的影响。沿着大江或者小河、在平原或者山地、在森林或者草原形成的农村居民点的多样性可以印证这一论点。自然因素对俄罗斯分布于北部、中部和南部村舍的影响同样表现了这一特点。

社会文化地理因素。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地方现象的典型性和唯一性，通过进程的特性和表现出来的地区特点，通过各种民族、宗教经济和社会因素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地域共同性的影响等得以呈现。

表现在经济活动、社会和文化进程特性中的地域差异，在文化遗产客体多样性中也有所体现。同时在保存至今的遗产客体中，一方面表现为与大型地域民族宗教同一性活动相关的广泛流行的形式，另一方面表现了少数民族、带有完全特定地域“纽带”小型宗教团体的独一无二的遗产。伟大画家、建筑家、科学家和其他各民族、画派、时期、风格的代表人物的作品也可以列为独一无二的遗产客体。伏尔加河沿岸和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和德国居民的传统农村居民点的典型建筑，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建筑文物，边境城市维保和坐落于俄罗斯中央地区的历史建筑特点完全表现了社会文化因素在遗产构成中的作用。典型性和唯一性相互关系的特点也适用自然遗产。当论及典型自然地块仅是借助于地方群体所赋予的宗教的特殊地位而保存下来时，肯娜泽尔斯克公园（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神圣”小树林可以作为例证。

关于形成遗产因素的知识对理解遗产的系统性“本质”、理解作为财富特定综合体载体的遗产现象事实本身的特点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从事遗产保护的工作者而言，更加重要的是了解对遗产状态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绝大部分的这一类因素都有明显的地理特性，即具有地域性特征且表现了地理环境的复杂多重性。

地理因素中的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对遗产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自然因素。遗产的客体经常受到各类自然进程的影响，并且常常决定自然遗产客体的构成。

遗产有效保护的重要条件是区分出危险因素最可能发生地的地点并且对此进行预测（维杰宁，1996）。正是由于这些预测，在这些地区可以事先采取全面特定的预防措施。

必须区分短期和长期的灾害性影响。短期影响有：地震、火山爆发、雪崩、泥石流、洪水。正是这些自然灾害可能导致珍贵建筑的自然构造的毁灭。因泥石流引发的堪察加半岛河谷的间歇性喷泉的灾害性事件，地震摧毁的伊朗巴姆，因强力海啸给恒河流域的红树林带来的损失等事件印证了这一影响。长期影响与浪蚀、剥蚀和侵蚀过程，与天气和气候的变化，与各种生物活动有关。这会导致诸如索洛韦茨基群岛迷宫、弗拉基米尔的古代宫殿（灾害性过程对古代宫殿的白色岩石的不良影响）等独一无二的古迹的毁灭；导致许多位于斜坡和其他易发生土壤流动的地区的古代建筑的墙体和地基的破碎等。

人为因素。对遗产状态造成不良影响的最常见原因：1. 大气、水体的污染对石砌而成、砖砌而成和木质的建筑物的状态产生不可逆的改变；2. 通常因建造新的水利工程系统（水库、大坝）造成的水分布状况的破坏、地下水条件的改变导致底层淹没、地基毁坏、房子和墙体出现裂痕等。类似这些人为因素对遗产客体作用的相关例子举不胜举。在所有的历史城市、大部分城堡和一些村落上，这些因素都有显现。

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对遗产客体产生的不良影响的最常见的例子是拆除所谓的“陈旧房子”，即在历史城市建筑区进行新的建设，这导致了历史建筑的被破坏甚至是完全毁坏。这一切都很典型，首先是针对大城市、大的工业中心。这些历史建筑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其慢慢地“死亡”。因为当地居民的迁出和无主房屋的毁坏使得整个村落都消失了。在农村，人口衰退最为明显。这些进程导致农村景观的衰退；荒草开始生长，荒野在扩大，水池开始积满淤泥。目前在俄罗斯中央、俄罗斯北部和大部分西伯利亚地区都可以见到这一景象。

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 20 世纪开始出现，当时许多古老的地主庄园和教堂被破坏。俄罗斯城市的历史中心遭到巨大的破坏，其中在建筑学中最大的、最重要的东正教教堂和穆斯林清真寺也被毁坏。

应当特别指出军事冲突所造成的影响。我们才见证了杜布罗夫尼克的毁灭、见证了科索沃或者北高加索因战争造成的破坏。但是欧洲最严重的文化遗产的摧毁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当时许多城市、村庄、庄园、寺

庙都遭到破坏。

地理构造、地理综合体、地理的主要部分和地理现象都是遗产客体。为了理解作为稳定发展因素的遗产的作用，要考虑到遗产的系统性以及与其他环境成分和要素关系的多样性。了解遗产在构成稳定的生存环境中的特殊作用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对待遗产客体的态度，即从保护个别的文物转变为保护历史文化和自然地域的综合体（维杰宁、舒利金，1992 年）。这可以是文化或者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或者自然地域，不仅包含建筑文物而且包含自然客体和综合体，当然还有各种观景点。这些地域客体大部分都占地几百甚至是几千平方公里。

在众多遗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自然保护区、历史文化保护区、名胜古迹地区和历史居民点。众所周知，地域和居民点——是传统的地理研究客体。在俄罗斯关于文化遗产的立法中将城市和农村居民点归为历史居民点时，居民点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在那坐落着有价值的建筑文物以及规划保存完好的居民点，这些特点可以将历史居民点视为独一无二的或者典型的城市建设的范例。例如卡卢卡、科斯特罗马、苏兹达尔、罗斯托夫、托尔诺克、大乌斯秋格和卡尔戈波尔等。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名胜古迹地区是指与伟大画家、作家、政客生活相关的，与国家历史的重要事件相关的、与特殊宗教功能相关的地域。这可以是在普斯科夫州充满 A. C. 普希金创作激情的地域庄园综合体，Л. Н. 托尔斯泰的庄园、索洛维茨基群岛——索洛维茨修道院坐落的地方，波尔金诺平原——1812 年历史之战的地方。归属于历史居民点一类的首都城市或者大的州中心城市兼有历史城市和名胜古迹的特点。一方面来说，他们以历史悠久著称，这些历史反映在历史建筑的多样性、按照俄罗斯和国外建筑师的方案修建的伟大建筑之中；另一方面来说，许多伟大的科学艺术活动家、政治活动家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他们为世界和民族文化做出巨大的贡献。这些城市中最重要的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科学和宗教中有价值的自然区域在保护遗产空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许多自然区中都有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其中克诺泽利耶——在那里至今保存着许多木质小教堂，小教堂里印着许多独一无二的口述遗产样式；这是一个与 И. С. 屠格涅夫的创作有关的自然客体（别任草地，位于奥尔洛夫斯基林地利戈夫村庄的周边）；奥卡河的堤岸对俄罗斯伟大的画家 В. Д. 博涅诺夫而言是真正的大师手笔；И. И. 希施金画作中的耶拉布